

新冠疫情對學術研究合作的影響

駐洛杉磯辦事處教育組

有韌性，以及因疫情所引發的資金轉變（funding distortion）如何重新平衡研究布局。」

國際化的提升或減少（More or less internationalism）？

史丹佛大學（Stanford University）研究學院副院長 Tim Stearns 表示，校園內的緊張局勢導致學生對大學行政部門的不信任感提高，而溝通未能傳達到所有相關的各方更惡化了這種情況。另一方面，大眾再次關注校園對於多樣性、公平性和包容性的承諾，對電腦資源需求的壓力也導致電子計算能力提升受到重視。

受疫情衝擊，大學縝密地思考學校在當地社區的地位，既是主要雇主，也在醫療保健和科學推廣（Science outreach）扮演重要角色。

隨著美國政治上的兩極化導致普遍信任的資訊來源遭削弱，Stearns 提出學術界該如何突破這個困境？他問道大學如何更好地調動出眾的研究能力，以提供政策資訊？又例如，大學是否應該與國家實驗室、生物技術或製藥公司進行更密切的合作？

Stearns 認為，鑒於全球化的人口移動趨勢，且傳染病無國界，顯然需要更多的國際合作，更何況科學是地緣政治的工具。史丹佛大學目前特別著重於提高靈活性、共享設施以及將永續性（sustainability）視為長期規劃的主軸。

四個不確定性

英國方面，倫敦大學學院（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）博士研究生院（UCL Doctoral School）David Bogle 副院長表示目前該校現有的國際合作運作良好，但新的合作鑒於疫情無法進展，尤其與發展中國家的合作受到的打擊最大。

在英國國內層級，在四個方面都面臨不確定性：疫情、英國脫歐、即將面臨的經濟衰退以及主要「英國研究與創新」（U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，簡稱 UKRI）研究機構領導層的變動。

Bogle 表示英國政府曾承諾大幅增加研究支出，將研發（R&D）經費佔 GDP 的比例提高至 2.4%，但在經濟衰退的情況下能否實現還

有待觀察。而退出歐盟可能導致英國被排除在歐盟執委會（European Commission）資助的合作計畫之外，除了經費的損失外，失去參與合作計畫的機會是最大的損失。

UKRI 領導層的換屆預示著改善研究文化的期待，競爭異常激烈的文化損害了研究生涯的吸引力。Bogle 並提到整個歐盟都對研發經費感到失望，但這些預算規模仍然非常可觀，計畫也確實能促進合作。由於大多數歐洲大學都是由國家資助，其國家資助機構都能維持一定的投資水平，因此在歐洲並沒有因為疫情而產生與 2008-09 年相似經濟衰退的預期。

長期變化

大流行對學術研究的長期啟示和後果為何？Katz 強調靈活度是一個關鍵問題，他提到如國家衛生研究院（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）以及世界各地的機構皆有類似情況，需要一段時間調整及回應，並在經費及期限上給予彈性。

與會者也表示研究空間配置也可能因在家工作的提高而大幅變化。Bogle 希望透過允許更高的獨立性，來遏阻一些研究計畫主持人的剝削行為，並在職業選擇方面更透明化，特別是學術界以外的職業選擇，從而使青年研究人員獲得更多正向經驗。

Hyatt 認為大學必須思考如何更好地應對未來的大流行，以及如何使研究界在面對這種巨大衝擊時更具永續性。Córdova 表示教學方式改革已被呼籲多年，而今次大學也借此以創新思維應對危機。Stearns 則強調，科學家的交流方式已經發生變化，線上討論、學術會議和研討會成為常態，儘管存在時區差異，但這為國際交流和討論提供了便利性。

本文作者 Bogle 總結，明顯地，科學界和學術界已被新冠病毒疫情徹底改變，而其中有很多變化將伴隨人們成為常態。

撰稿人/譯稿人：陳潔希 / 藍先茜

資料來源：大學世界新聞

<https://www.universityworldnews.com/post.php?story=2020090413393595>

